

#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 ——龙港镇的崛起和发展

刘爱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小城镇建设迅速发展。到1988年底，中国已有10609个镇，其中浙江新兴小城镇龙港镇——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因其建镇特色吸引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广泛注意。

### 一、龙港的崛起

1. 区域条件 龙港镇，原名方岩下，是浙江省苍南县有名的穷地方，但它却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浙江省八大水系（从北往南依次为苕溪、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敖江）之一的敖江入海口，地处全省最南端的苍南县东北部，往东约5海里是东海，到台湾基隆港约180海里（相当于温州到宁波的海上里程），敖江江宽450米，敖江南岸港口（即现龙港港口）历史上曾有2000吨级货轮进出，也是浙江省距台湾岛最近的港口。北去2公里即为104国道，且有稠密的内河航道连接宜山、钱库等地。此外，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温暖润湿，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节气候区。

2. 龙港的建镇特色 1981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苍南县。当时近百万人口的苍南县，决定在地理位置优越的方岩下建设自己的经济中心。1983年11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龙港镇<sup>②</sup>，1984年4月正式成立龙港镇人民政府。建镇伊始，既没有人，又没有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员陈定模主动请战，带着6000元开办费来到了龙港，进行大胆改革，开拓前进，制定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建镇措施。

①对外开放——政策优惠吸引能人。为吸引农民进城，龙港镇府提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的口号，并成立了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还将龙港镇委和镇政府的一整套鼓励农民进城开业的优惠措施通过《温州日报》、《浙江日报》等新闻媒介告诸全省人民。同时，为了使农民进城的新观念让那些深受小农经济思想束缚的人接受，他们“依靠地皮优势，发挥嘴皮作用”，成立了农民进城宣传队，携带规划图，多次分赴全县12个区镇宣传龙港的优势、发展前途以及各种优惠政策。通过宣传，使心存疑虑的先富农民看到了龙港未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到1984年底，就有3省7县的5000多户申请进镇建房落户。据1989年6月的问卷调查（抽样比为3%），68%以上的住户是从金乡、宜山、钱库、水头等地搬过来的。

②农民集资建设城镇。首先，他们把有关地租的理论变通为有偿使用土地的政策，提出“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的办法，每间地基以42m<sup>2</sup>为单位，根据规划中的不同地段、经济效益的高低，划分为6个等级价格，除收取征用土地费之外，还收取不同的公共设施费，高的达4400元，最低的700元，到1985年底就征收了1000万元公共设施费，基本上解

决了街道三通一平工程的投资；其次，采用合股投资建镇的办法，吸引经营大户和企业家在龙港投资建厂，到1989年，龙港镇已有合股投资的企业189家，建成了11个专业市场。它们对龙港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三，捐资。初建时的龙港，教育、文化等一片空白。他们成立了“集资办学领导小组”，鼓励镇属各村捐献3—5亩土地，鼓励驻镇各局公司、工厂投资，鼓励经营大户、企业家慷慨解囊，镇政府对捐资的个人与集体予以通报表彰，立碑留名，发匾纪念等。通过宣传发动，龙港很快掀起了“办学热”，到1985年底，他们捐到资金175万元，建了10幢教学楼，解决了入学难问题；第四，合资经营，主要是外省与龙港的合资企业，以各自出资兴办，利润分成，目前有哈水万茂公司、电子电器公司、龙华羊毛衫厂等十几家。

3. 在科学规划中求生存 龙港之所以能吸引四方能人前来龙港落户，科学的规划起了很大的作用。1982年9月，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苍南县建立龙江港区；并委派技术人员帮助作了规划，规划拟定龙港为全县物资流通的集散中心；1986年12月，已经建设了近两年的龙港（那时龙港已初具规模），又与浙江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了龙港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龙港为苍南县经济中心、港口城镇，远期与敖江合并，最后使龙港成为瓯南闽北经济中心，温州市域中等规模的港口城市的设计。同时对龙港的总体布局、工业、对外交通、仓库、生活居住、公共建设、城市道路、园林绿化、市政公用设施、蔬菜基地等一一作了详细的规划。1988年9月，面对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龙港镇府又邀请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美球教授等4人，为他们作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至此，龙港的规划已打破了城市单一规划的界限，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参与规划，它为龙港今后的工作重点指明了方向。科学的规划增强了对农民的吸引力，提高了城建效率，避免了用地、建设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也为初涉城市文明的中国农民和从中国农村基层摔打滚爬出来的干部开展城市工作提供了方便。

4. 管理创新获高效 在城镇建设全面铺开时，龙港政府及其苍南县领导坚持改革精神，采取了几项灵活变通的办法。①由政府统包统揽搞建设到责、权、利落实到个人。龙港政府对私人建房没有实行统包统揽的办法，而是按照已拟定的科学规划，从房屋结构造型到建材筹措全由建房户自己决定，政府只按规划检查施工结果。市政设施施工时，政府向群众宣传了路面的宽度、厚度以及水泥的标号，由于建造住户房前道路的资金是住户出的，所以，当工程队施工到住户房前时，住户都自觉地检查施工质量。对街道两侧的绿地，龙港镇府也实行了三包（包种、包管、包活）原则，规定每家门口要种一棵树，出15元由镇政府统一购苗，分给每户自种，如果种不活，来年春天还得自己掏钱购苗，结果，群众对种树很负责任，马路两边的树苗成活率达90%以上。②在欢迎农民进城问题上，苍南县委、县政府打破常规，大胆革新，实行“减”印，改变原来农民进城一般要经过社队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局、土地管理所、房产管理所、基建局、镇政府和计委等单位盖8颗大印的做法，派各部门有关人员到龙港联合办公；现场拍板决定，把8颗大印“捆”在一起盖，使农民免除了申请表统统要在各部门旅行几个月，跑几十趟县城，求三姑、拜四嫂之苦。从而加快了城镇建设的步伐。

龙港的建镇历史表明，基层领导的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积极引导带有传统色彩的农民是城市建设的关键。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可忽视基层领导的作用，作为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他们对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根据当地实情对政策的灵活运用，是整个国家行政系

统高效运转的关键。

经过5年的建设，从前灯不明、路不平、水不清的龙港，如今已变成了一座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富有现代化气息的城镇。1988年龙港镇人口为41659人，非农业人口为28507人（其中自理口粮人口为23519人，占82.5%）。由于龙港镇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来的，居住在镇里的龙港人虽从事非农产业，但大多数人依然是自理口粮，因而人们把龙港称之为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到1988年时，农民城已有了国营企业50家，集体企业22家，股份制企业189家，个体工商户3887家（其中有登记的为1804家）。工农业总产值达1.6639亿元，是1984年的29倍。工业产值为1.4921亿元，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股份企业和私人企业的产值为1.0291亿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68.7%；一轻企业产值648万元，占4.34%，二轻企业产值2037万元，占13.65%；其他县属工业1945.5万元，占13.04%。农业产值1678万元，只占全镇工农业总产值的10.1%。1988年财政总收入为1230万元（其中工商税882万元），市场成交额3.32亿元，人均收入达1190元（若按抽样调查，1988年人均收入为17353元），1988年人均创产值3961元，创税收235.6元。

## 二、龙港的经济和社会运行格局

1. 经济特点：①产业结构已突破了传统的以农为主的框架，逐步向开放的、多元的产业结构转化。（见表1）②工业以轻工业为主导，1987年从事轻工业人数3624人，年产值50909.8

表1 1987年龙港镇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产 值	数量(万元)	1677	6906	7376	15359
	百分比(%)	10.5	43.3	46.2	100
从业人员	数量(人)	3389	4199	7331	14919
	百分比(%)	22.7	28.2	49.1	100

万元；重工业职工575人，年产值1814.96万元。轻重工业的劳力比例为86:14，产值比例为74:26。骨干行业有塑料编织、标牌证卡、服装皮革、包装装潢、机械等。塑料编织行业产值最高，1987年产值为1140.4万元，从业人员357人；其次是标牌证卡行业，产值1053.78万元，从业人员672人，两者合计约占镇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约占全镇工业劳力的四分之一。（见表2）龙港的工业特点可以概括为“轻、劳、陋、小”四个字。即以轻工业而且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为主，骨干行业多半是技术简单、设备简陋的传统性行业，产品都是些小商品，企业规模很小（1987年龙港镇平均每家企业的职工人数为17人）。制度化的工厂管理手段也尚未确立。可以这么说，龙港的工业依然停留在草根工业的阶段，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靠的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靠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利用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毫无疑问，家家工商副，户户机织声的局面只能导致资金和技术的分散和浪费。（3）以工兴贸，以贸促工。到1988年，龙港的专业市场达到了11个。（见表3，这里缺编织市场资料）这些市场多半是集资兴建起来的，每个专业市场都拥有比较齐全的商品和货源，价格完全放

表2:

1987年龙港国营和集体工业\*的产值及劳力

行 业	产值 (万元)	占工业总产值(%)	人均产值(元)	劳力数 (人)	占工业总劳力(%)	企业个数(个)
塑料编织	1140.40	16.51	31944	357	8.50	13
标牌证卡	1053.78	15.26	15681	672	16.00	23
纺织印染	775.77	11.23	9316	940	22.39	11
食品加工	767.30	11.11	21246	361	8.59	10
服装皮革	461.17	6.68	11764	392	9.34	8
化 工	375.50	5.44	78229	48	1.14	2
机 械	349.90	5.07	13007	269	6.41	2
印 刷	342.45	4.69	12144	282	6.71	11
建 材	227.30	3.29	18331	124	2.95	4
金属制品	221.50	3.21	16780	132	3.74	4
文体卫生用品	56.69	0.82	4572	124	2.95	5
船 舶	43.16	0.62	3819	113	2.69	3
电 子	7.00	0.10	3333	21	0.50	1
其 它	983.00	14.23	2700	364	8.67	152
合 计	6905.94	100	16447	4199	100	249

\* 所谓国营和集体, 是就工商登记而言的, 这里面有70%的企业实属财产建立在私人所有基础上的股份合作企业。

表3:

龙港镇专业市场情况表

市场名称	面积 (m <sup>2</sup> )	摊位数 (个)	造 价 (万元)	日上市人数(人)	日成交额 (万元)	货 源
第一菜市场	2700	420	11	10000	20	福建、宁波、海门
第二菜市场	2151	140	13	2000	7-8	福建、宁波、海门
第三菜市场	1850	128	5.5	3500	15	福建、宁波、海门
农贸市场	1155	50	5.6	300	20	山东、河南
小商品市场	1080	90	4.5	3000	32	瑞安、上海、广州、福建
服装市场	3988	186	70	1000	10	瑞安、上海、广州、福建、温州
生产资料市场	2030	32	16.5	200	60	福建、上海、温州
第一木材市场	4620	80	15	250	42	福建、温州、莆田
第二木材市场	2478	40	10	100	20	福建、温州、莆田
水产品交易市场	1500	—	19	250	—	龙港、敖江

开,市场的辐射面比较广,许多市场是店场结合,如服装市场,往往是前店后厂。与专业市场相配套,目前在龙港及其周围还活跃着一支约2万人的购销队伍,他们把各区、镇的小商品通过龙港打出去,又把需要的原材料通过龙港运进来。专业市场和信息灵通的购销员,成为龙港商品流通顺利进行的关键。它不仅推动了本社区的经济兴旺发达,还把龙港的经济与其他区、镇的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使龙港这个小城镇起到了物资集散地、周转地和联结城乡商品交流的桥梁作用。

2. 教育:发展迅速,但结构不够合理。1984年以前,龙港只有方岩和新渡两所小学,学制为初小,共有280名学生,15名教师。经过政府的动员和社会集资,从1985年到1988年,龙港镇教育事业累积投资达650万元,其中600万元是社会集资。建起了3所小学、两所中学,小学生人数达5374人,配有教师171名;中学生2097人,配有教师97名。此外,还建立了一所中心幼儿园和一所聋哑学校。教育质量稳中有升。在各种单科统考和知识竞赛中,龙港学生也榜上有名。教育发展存在的根本问题是,龙港的教育同样也是围绕着升学指挥棒运转,没有考虑从龙港具体的情况出发,通过教育培养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合格的劳动力后备力量。对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益的职业技术教育还是一片空白。

3. 与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滞后现象日益突出。首先,龙港的社会治安从1986年开始混乱,失窃等现象(1986年以前龙港尚有路不拾遗之风)日益增加,1987年龙港的治安案为133件,刑事案111件,1988年时治安案增加到146件,刑事案176件。问卷调查表明(抽样比3%),77%的人对治安抱有很大的不满。其次是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有关的经济犯罪增加,主要是由于龙港人法律观念淡薄,对经济合同一知半解和凭传统感情担保所引起的合同纠纷比较多。1987年龙港镇人民法庭受理民事和经济案件62件,其中合同纠纷22件,占35.5%。此外,与整个社会商业道德水准有关的(如龙港人在外地经商吃了亏,在当地如法炮制)违反公平的商业精神的案例增加,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表明农民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由于正式的制度化社会控制手段的缺乏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尚未建立,没有适时对农民进行引导的结果。第三,传统的风俗习惯依然在顽强地表现。如不少龙港人在婚丧嫁娶上很讲排场,一次结婚所花费用一般均在15000元以上,一次丧葬所花费用也不下万元,大量的消费和风俗中的封建迷信思想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4. 行政方面,在龙港崛起过程中,行政的适时适度引导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龙港崛起以后,龙港乡镇基层政权的基本任务已由原来的动员四方能人进龙港,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建龙港转变为完善龙港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推动龙港生产力的发展,对城镇的经济、管理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管理。但在领导龙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龙港乡镇基层政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当前龙港镇政府组织状况而言,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镇政府的机构设置没有形成规范化,导致了各种政府职能的紊乱。表现为机构设置重叠,几种相近的职能不能统一起来,城建办、规划办和市政办各行其事,影响了“城镇建设和管理”这一龙港政府作为工作重点的主要职能的发挥;有些机构力量薄弱,工业办仅有2名临时工;有些应该设置的机构(如农业生产)却没有设置,对现代城市管理极为重要的科技管理和推广、卫生管理工作等均无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第二,机构设置没有系统性,缺乏统一协调各种机构工作的中心机构,因而不能平衡各方面的工作;缺乏具有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机构,相应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一个人口规模近5万人的城镇,政府没有设立主持日常工作的办公室,让人难以想象。由于该管的没管好,

造成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也难以起到管理和引导的作用。

### 三、龙港崛起给我们的启示

龙港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它的崛起和发展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方面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1.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要经历若干阶段。理由在于：①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拿不出那么多投资来发展工业和搞城市建设。以“六五”期间而论，城镇每年需要安置600万人就业，即需新增基建投资和公用设施投资480—840亿元，可是，我国“六五”期间的基建投资平均每年不过400亿元。（《东方现代化启动点——温州模式》，孙超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95页）安排城镇本身新成长的劳动力已困难重重，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不能靠人为的“跃进”来完成的。以经济发展（其中主要是工业化的实现程度）为主要基础的现代化过程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 人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农民身上，沉淀着许多旧文化的因素，使他们形成了不少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传统、习惯和观念，这些旧的观念、习惯和传统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逐步消解。改造旧的农村社区文化的渐进性也决定了农村现代化具体实践的渐进性。现代化的另一个主要基础——社会发展（主要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也只是逐步进行的。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农村当前的具体状况，就可以把渐进性的特点看得更清楚：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在农村第一步改革中，第一级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他们仍然在原来的村庄中依靠土地为生，借以谋取温饱；第二级是“不离土半离乡”的农民，他们在农忙时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劳动，农闲时离开居住的村庄外出打零工，但他们毕竟还是农民；第三级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也就是仍居住在原来的村庄但已经不从事农业劳动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劳动。在这一级中，工业化水平有一定提高，兴办了乡镇企业，集镇（或小城镇）的规模有所扩大，苏南模式可以看成这一级的典型代表。龙港道路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高的过渡阶段，即第四级“离土又离乡”，“农民”主要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活动，他们已经脱离了原来居住的村庄，在一个更有利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活动的地方组建一个新的城镇，但还不是城市，他们已经不是农民。可见龙港在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中达到了高峰，它恰恰走出了符合温州地区具体情况（在全国亦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即农村人口——城镇化——城市化。

2. 中国没有普遍适用的现代化模式。随着对外开放，我们已经深深认识到我国的落后和实现现代化的紧迫。在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时有一种不良倾向，即总希望找出一条普遍适用的现代化道路。然而象过去“农业学大寨”那样树起某个样板在全国推广，结果只能事倍功半。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而每一地区的具体条件、环境又有各自的特点，因此所谓“××模式”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适用。国务院农村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卢迈1989年3月24日在“龙港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曾指出：“龙港是温州试验区中的一颗明星，龙港道路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独特道路。”龙港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在中国目前现行体制和条件下，在一些有希望的地点兴建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城镇将有助于对农民的改造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

3. 现代化要经历分娩前的阵痛。正如英国“羊吃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样，龙港作为温州模式的集中体现，在通向现代化的路途中，也要经历分

破产的痛苦。在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正确的富民政策以后，许多家庭为了家庭工业和个体商业发展而进行积累，不惜过省吃俭用的清苦生活，不惜子女弃学，不怕起早贪晚，长年孤独地奔波，这是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所做的一种努力。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还将经受另一种磨难。龙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家庭工业、个体商业和服务业发展起来的，1988年龙港镇共有8500多户人家，却有3800多个体工商户，基本上是5家中就有2家从事家庭工业和商业生产。以财产私有为基础的股份合作经济比较发达（1988年这种形式的经济产值和从业人数均超过70%），雇工相当普遍，根据问卷调查（样本100，抽样比为3%），每家雇工从4人到50人不等，马克思所言的一定量的剥削依然存在。随着经济发展，雇主和雇工的收入差距增大，贫富差距将会扩大，1988年表明龙港镇民家庭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401（1984年全国城镇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168，农民家庭为0.264），最穷的20%人口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为5.7%（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为14.42%），最富的20%人口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为52.54%（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为26.6%）。（龙港数字根据3%抽样问卷调查计算，全国性数字见《中国统计摘要》1989年，第9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穷人的相对剥夺感将进一步增加；作为自理口粮的“居民”，他们还将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实际上的居民与户籍上的“农民”这种身份角色的两难境地；在传统文化面临现代文明冲击的情况下，龙港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将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甚至行为很可能处于失范，等等。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充满辛酸和喜悦的艰苦创业史。

4. 中国的现代化主要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现代化需要广泛地发动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经济政策，它使农民得到了发展生产和无限致富的希望和刺激，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人民公社体制的消亡，给了农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过份集中化和组织化环境下难以调动起来的农民，在新的经济政策下被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来了。正如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谈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问题时所说：“当现代化的闸门打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变化就会涌现出来。各行各业都在变，农业更是如此。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农民试图利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技术和新机会。令人注意的是农民，即使是文盲，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学得最快，而且很快地采取适当的行动。”中国的经济政策正是给予农民以新的机会，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调动了农民，而且通过农民调动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有效使用。在收入和闲暇增加的前提下，农民有了选择非农产业的机会，而1984年制定的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从事各种工商活动的政策，给农民提供了更好地发挥自己优势的希望。中国这一系列有效的农村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村的各种资源为现代化服务。由于动员了农民的力量，从1978—1988年10年间，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产值从1978年的640.54亿元增加到了1988年的6459.79亿元（《中国统计摘要》198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2页），总增长为1008.55%，平均每年增长为27.15%，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员：这里仅指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也从1978年的2217.8万人增加到了1988年的6202.7万人（《中国统计摘要》，1989年，第21页），总增长为279.68%，平均增长为10.91%，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力。龙港的崛起是及时利用了党的新经济政策的农民，在富有创新精神的基层党员干部引导下的产物。龙港的崛起进一步告诉我们如何发动农民和最广泛地动员农村资源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龙港镇的独创性建镇道路，为如何动员中国农民进行现代化，如何改造中国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

（下转第37页）

## 7. 加强房地产立法建设。

房地产业的发展,要求把房地产经济活动的准则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房地产法成为管理、调节房地产经济活动的工具。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房地产的立法内容广泛,而且数量很多。以日本为例,直接间接和房地产有关的法律就有30多种,其中包括《宅地建筑物经济业法》、《宅地建筑物贩卖业法》、《农地法》、《住宅地区改良法》等等。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有关房地产的部门立法。已经颁布的行政法律仅有《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法》、《外国人私有房屋若干规定》等少数几种。现在正在起草的立法仅有《住宅法》、《房地产法》、《公房管理条例》、《拆迁办法》、《商品房价格管理办法》等等。

我们要加快制订和完善房地产交易、价格、租赁、管理等方面的立法,以保证房地产业的正常运行。同时,各地区、各城市也要根据当地房地产业的发展情况,制订一些地方性的法规。有条件的城市可以设立房地产仲裁法庭,以调节房地产的纠纷。

注:① 《广州房地产信息》,1989年第3期,1990年第1期。

②③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3页,第474页,第545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8页,第699页,第729页。

⑧ 《中国房地产》,1990年第1期;《广州房地产》,1989年第1期。

⑨ 《广州房地产》1989年第1期。

---

(上接第20页)

5. 高效运转的行政系统对经济、社会适度的干预,有利于现代化的进程。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注意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目前龙港的问题是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层次低下,缺少骨干企业和龙头产品,缺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工厂制度尚未建立,银行和税收等部门短期行为严重,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无视对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和新兴行业的扶植;现代商品经济所需的契约精神尚未确立,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还是一片空白,教育发展迅速,但结构不尽合理;现代化人格的形成面临着传统势力的挑战。这一切使龙港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低水平的经济发展超前和社会发展滞后,观念更新引起的冲突造成一种文化堕距的产生。龙港问题的解决和它的前途,有赖于一套高效运转、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系统。如果目前龙港乡镇基层政权机构设置不能规范化和系统化,各部门目标职责不清、功能发挥不力的局面不改变,如果大多数干部的素质不提高,那么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协调发展就无从谈起。龙港的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解决将提供给我们一种有现实意义的现代化知识。